

21 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文化素质课系列

# 中国哲学

# 智慧

主编 向世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西方哲学智慧

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

外国文学作品选读

中国文明史

世界文明史

大学物理基础

大学生物基础

大学化学基础

21 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文化素质课系列

# 中国哲学智慧

主 编 向世陵

撰稿人 向世陵 邢东风 姜日天

彭永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哲学智慧/向世陵主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0  
21 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ISBN 7-300-03583-3/G·721

I. 中…

II. 向…

III. 哲学思想-中国-高等教育-教材

IV. B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44189 号

21 世纪素质教育系列教材  
文化素质课系列  
**中国哲学智慧**  
主编 向世陵

---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海淀路 157 号 邮编 100080)  
发行部: 62514146 门市部: 62511369  
总编室: 62511242 出版部: 62511239  
E-mail: rendafx@public3.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丰台丰华印刷厂

---

开本: 787×980 毫米 1/16 印张: 15.5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字数: 281 000

---

定价: 18.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 总 序

素质教育的概念，在最初的时候，是针对理工院校学生缺乏人文知识的训练而提出的。作为一所以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经济和管理科学为重点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虽然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领域在全国具有优势，但同样存在着学生缺乏自然科学训练而带来的知识结构偏差。为了克服乃至纠正这种偏差，早在 80 年代的“教学方案”中，我们就尝试设置了“文化基础教育学群”，包括中国通史、世界通史、自然科学概论、社会科学概论等课程。并且，逐渐由全校性选修课改为指定选修课或必修课。1993 年，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制定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指导下，我校对“教学方案”作了较大的调整，把培养学生的素质和能力作为一项重要目标明确地提出来。在全校范围内，提倡开设中国历史、自然科学概论和当代新兴科学介绍等课程。历史、文学、哲学、美学、科技等课程，逐步构成了具有我校特色的“通识基础课”。中国传统文化概论、当代科学技术概论、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等，亦分别成为公共必修课。

1999 年是我国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改革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在这一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表，加强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培养适应 21 世纪需要的合格人才，成为教育界共同努力的目标。同样是在这一年，我校的“教学方案”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素质教育系列课程成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教学方案”的规定，作为全校公共必修课的素质教育课，分为自然科学课、人文素质课和艺术教育课三个系列，学生必须分别修满3学分、6学分、3学分。至此，我们关于素质教育的方向已经确定，思路已经明晰。

教材建设是建设好素质教育系列课程的关键。我们在设计素质教育系列课程的同时，便已着手组织相应教材的编写工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人文素质教育教材，正是我们组织编写的素质教育系列课程教材的一部分。

这套丛书是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的精神而编写的，目的在于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在文史哲等人文学科具有的优势，克服原有的教学思路和管理体制带来的学生知识结构偏差的弊病，期望通过此套教材，培养学生的人文关怀意识和科学实证精神，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和科学素质，使这些学科的知识真正成为学生素质的有机构成部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这套丛书共有9本书，分为四个部分，即哲学智慧（中国、西方）、文明史（中国、西方）、文学作品选读（中国古代、西方）和大学理科课程（物理、生物、化学）。这样的课程配置，可以使学生既掌握了人文知识的精华，又学习了理科科学缜密的思维方法和严谨的作风。参加这套丛书编写的教师，都是我校相关学科的教学科研骨干。在确定提纲和编写教材的过程中，参编教师、学校教学管理部门和出版社进行了多次研讨，力争使教材体现素质教育精神。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素质教育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和提高，也是一个需要多方面努力的事情。我们期望通过这套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能够为此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教材工作委员会

2000年7月



## 序 言

为了适应新时期本科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需要，我们根据学校的要求，编写了这本《中国哲学智慧》教材。人的素质的提高，是多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哲学和哲学史的教育、理论思维能力的训练，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哲学是中华民族智慧思辨的结晶，是我们从先人那里承接下的一份宝贵财富。我们编写这本教材的目的，就在于使青年学生通过对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国哲学智慧的学习，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以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本书的特点主要是：

第一，注重中西哲学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力求突出中国哲学自身的特点。英国哲学家罗素著有《西方的智慧》，实际上是西方“哲学”的智慧，而中国哲学的智慧显然与此有别。本教材从中国文化和哲学的特点入手，对在哲学思维上的西方中心论作出了回应，并以尽可能简短的形式对几千年的中国哲学的特点进行了阐释，突出了天人之际这条中国哲学的主线，展现了中国哲学与社会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揭示了贯穿中国哲学始终的生生不息和变化日新的辩证思维本质。

第二，从哲学学派和哲学问题的结合上组织材料，力求突出每一个时代哲学思维的精华所在，尽可能合理地总结出哲学智慧的发光点。每一位哲学家都有他自己对于时代所赋予的问题的思考和对于前人的哲学智慧的继承，但出于不同的动机、感受和才力，他所作出的哲学概括也就不尽相同，因而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分属于不同的哲学派别。其智慧的发展就既有原有理论体系的深化，也有新的理论观点的提出，以及由一点向另一点的扩展推广，从而表现出中国哲学智慧的连续性、丰富性和多样性。譬如同样都考虑人性的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却有众多的主张和观点，其争论绵亘几千年不息。学习和思考古人的智慧，能够潜移默化地训练我们的思维，增进我们的见识，激发自身的智慧。

第三，注重智慧点的发掘，尽量减少一般哲学史教科书中大量的与哲学无关的背景知识的交待。哲学智慧与日常生活智慧虽有联系但毕竟不能等同，哲学家“聪明”在何处、他的智慧表现在哪里、带给人们什么教益，等等，是本书力图发掘的重点所在。我们要告诉学生的是，学哲学不仅仅是学哲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增进哲学的智慧。因为知识是死的，而智慧却是活的。这是从中国古人的哲学思辨中所应当吸取的最重要的教益。

由于篇幅的缘故，本书的编写不得不忍痛割舍了不少有重要影响的哲学家和哲学流派的思想。譬如汉以后的道教哲学，宋代的王安石新学，事功学派哲学，明代的刘宗周心学，等等。同时，本教材新增的“明清实学”，其中的一些学者的思想就其理论价值来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并不太重要，所以将他们选入，是因为他们反映了那一个时代中国人的重“实”的特点和风气，确有发人深省之处。时代的特点是本教材选择撰写内容的主要依据。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本书的特点之一。

第四，本书所说的“中国哲学”的智慧，因是立足于中国社会固有的特点，也就只讲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智慧，没有包括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因为后者主要表现为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对于这部分知识和智慧，读者可以从西方哲学智慧和近现代哲学的专门书籍中获取。本书的一大任务是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及其哲学，在传统与现代的磨合中产生的新的问题和思想，已经超出了我们这本教材所能覆盖的范围。

第五，由于本书要兼顾历史发展与哲学问题和流派，故采取了少章和多节的办法来处理。全书共设四章，另加引言和结语，共计六个章级部分。“引言”部分简要阐明中国哲学的特点及其对西方中心论的回应，分有三节；第一章介绍先秦诸子哲学，以学派为线索揭示中国哲学成型时期的代表性观点和思想，分有八节；第二章讲述汉唐哲学，由于汉唐部分学派和问题众多，采取了以问题为主线

兼顾学派发展的办法，共有九节，是本书中分量最多的一章；第三章主要讲述了宋明哲学的主流——宋明理学，按通行的理学三大派的方式进行阐发，故只有五节；第四章则是讲以重“实”为特点的明清实学，重点在明末清初，共有七节。接下来是“结语”部分，简要勾勒了智慧和自由的关系。为了方便学生复习和自习，我们在每一章后列出了本章的思考题。书末开列了主要的参考书。

最后，《中国哲学智慧》与通用的中国哲学史教材无疑具有密切的联系，在一定的意义上，前者也可以看做是一部浓缩的小型《中国哲学史》，但其取舍和重心则有所不同。因为本书是作为公共课教材面向全体学生，也就不可能照搬作为哲学专业课教材的《中国哲学史》。本书以学派和思想发展为主要线索，突出了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力求将知识传授与智慧开发结合起来，尽量做到深入浅出、明白易懂。希望通过对此书的教授和学习，使学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能有所感悟和把握，对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有所帮助。

作者

2000年8月





## 目 录

引言 中国哲学的特色	1
第一节 “神奇国土”的文化	1
第二节 “远离欧洲”之路	3
第三节 源远流长的传统	7
思考题	20
第一章 先秦诸子哲学	21
第一节 智慧的萌发	21
第二节 《易》为六经之首	23
第三节 爱人而知天	27
第四节 兼爱与三表	40
第五节 无为之道	44
第六节 名辩之学	50
第七节 讲法的“道理”	53
第八节 阴阳五行说	57

思考题 .....	60
<b>第二章 汉唐哲学</b> .....	61
第一节 天人感应与天道自然 .....	61
第二节 名教自然之辨 .....	67
第三节 本末有无之辨 .....	73
第四节 言意之辨 .....	84
第五节 神灭与神不灭 .....	88
第六节 万法唯识 .....	96
第七节 圆融无碍 .....	102
第八节 顿悟成佛 .....	109
第九节 道统与性情 .....	119
思考题 .....	127
<b>第三章 宋明理学</b> .....	129
第一节 理学概说 .....	130
第二节 无极与太极 .....	138
第三节 “天理”的体贴 .....	146
第四节 本心与良知 .....	161
第五节 太虚即气 .....	172
思考题 .....	184
<b>第四章 明清实学</b> .....	186
第一节 东林新风 .....	187
第二节 经术经世 .....	191
第三节 综当代之务 .....	196
第四节 气学与实学 .....	201
第五节 颜李学术 .....	209
第六节 气情理之辨 .....	214
第七节 实事求是 .....	218
思考题 .....	224
<b>结语 智慧与自由</b> .....	225
思考题 .....	232
<b>主要参考书目</b> .....	233
<b>后 记</b> .....	235



## 引 言

# 中国哲学的特色

哲学是智慧的学问，而智慧之树常青。人类的智慧、特别是哲学智慧犹如生生不绝的源头活水，滋润和启迪着社会与文明的进步发展。

中国哲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是中华文明智慧的集中的体现。学习中国哲学不是单纯的知识积累，而是在树立深厚的历史感的基础上并以全部历史经验为内容的智慧的熏习，哲学的思维与时代精神的脉搏始终保持着同步的跳动。

## 第一节 “神奇国土”的文化

中国，古人称天下中央之国也。自从盘古开天地，普天之下，共分为九九八十一州，中国居其一，名“赤县神州”。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三皇五帝到如今，由总称为“华”族的诸民族的文化汇聚而成的中国文化，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在这条宽广深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的先辈们创造了多姿多彩、绚丽壮观的优秀传统文化，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走在了世界的前列。

中国文化，这里主要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是世界主要的文化形态之一，是全人

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适应于中国社会在地理环境、经济结构、民族心理、语言文字、思维方式等方面的特殊性和特殊需要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最终成形为独具特色的中华民族文化。故中国文化与一般的人类文化就既有同一的属性,又有明显的差别,在她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文化的世界性和民族性的有机统一。

“文化”一词在中文,本是以“人文”“化成天下”之意,意味着人以其所创造的各种器用、制度、语言、行为和观念等非自然的产物来对所谓“天下”、实即人所面对的世界施加影响,从而使“人”区别于物,并使世界在一定的层次和意义上符合人的目的和需要。在此意义上,文化也就是人类对自然和世界的“人化”。

“人化”既然反映的是人的目的和需要,人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也就在文化诸要素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哲学的智慧正是从这里开始发源生长。哲学通常被认为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爱智慧乃是“哲学”的本分,哲学对人的意义,首先就体现在对人们“化成”世界的活动和人的日常生活实践给予切实可行的理论指导,它在整个文化传统中的地位也就由此而表现了出来。那么,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就应当学习中国哲学;而一旦通晓了中国哲学,也就从根本上认识了中国文化。

中国哲学智慧是中国哲人在追求真理、也即“闻道”、“求道”的实践中所取得的智慧之果,它集中体现了中国哲学的精神。哲学智慧与解决日常具体问题的实用型智慧密切相关,但二者之间又存在着层次的区别。从“智慧”一词的发端看,孔子讲“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老子言“智慧出,有大伪”,墨子则认为不应当让“不智慧者”来治理国家,他们都没有明确界定“智慧”的内涵,因为模糊性本来就是中国哲学的一大特点。但从总体上看,“智慧”的运用既涉及到人应对实际问题的聪明才智,又体现了人的意识的自觉和理论思维的水平。孟子说过,“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这里的“智慧”显然是日常实用型智慧,因为它还没有上升到对“势”的思考,只有善于“待势”和“乘势”之人,才能取得事业的成功。而这正体现了哲学的精神。从而,哲学智慧超越于日常实用型智慧,因为它的宗旨是探求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向往的是终极的理想境界,并为此而形成为一整套特定的思维范式和理论体系。所谓“上智”、所谓“大伪”的意义,也都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给予解释。

中国哲学智慧根植于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体系,智慧的火花遵循着逻辑和历史一致的原则,在历史的进程中源源不绝地从中国人的思维中迸发,并通过对先哲们心灵和思维的启迪,最终促成了他们对“道”的解悟和由此而带来的精神的超越。中国文化传统正是在中国哲学智慧的不断生成之中一代代传承下来的。

中国哲学又称中国哲学史,“史”的概念意味着中国哲学智慧的重心是定位在中国古代、亦即传统社会的哲学思辨,它要求揭示中国社会在保持其完整独立

的社会形态时成型的理论体系及其发生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通过对它们的学习，不但可以增进我们对前人智慧的了解，而且有利于加深对民族文化传统的认同，触发我们的创造性的灵感，以无愧于祖国和时代的召唤。

## 第二节 “远离欧洲”之路

中国哲学发展的道路和走向无疑与全人类哲学的整体发展导向相联系，但它更是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相适应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从中国哲学形成的先秦时期开始，虽然大致都经历了一个“轴心时代”，出现了一批标志着人类的觉醒和精神的解放的历史文化名人及其辉煌的代表性成果，在他们之间，其文化修养和理论造诣也有着若干的相似性，但从更为根本的意义上说，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中西文化及其哲学已经走上了各自有别的发展道路。

### 一、中西哲学的不同背景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的基础之上的，它的经济基础是以分散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与以古希腊为代表的地中海沿岸国家工商业和贸易兴旺发达的情况迥然有别。自氏族社会解体 and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中国虽也出现了奴隶制的社会国家制度，但其奴隶制的发展却是以“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来实现的，天下为“公”与天下为“私”反映的是同一的历史事实。即使在春秋战国以后，土地的国有和私有共存也始终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现状。

与中国奴隶制社会的不充分形态形成对应的，是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始终一贯的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得十分完善和巩固。相比之下，西方文明走过的道路却完全是“背道而驰”。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奴隶制成为奴隶制社会的典型形态，而欧洲君主专制政体则又十分晚熟，乃至后来成为了资本主义新经济形式的庇护所和支持者。故当西方文明的奠基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城邦奴隶制稳步发展的基础上建构他们的哲学体系，并从而最终奠定其哲学发展的基本格局的同一历史时期，中国已开始了由分封的诸侯国通过兼并战争而走向“天下”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道路。以孔子、老子等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家群体的出现和中国哲学的成形，是与当时奴隶主阶级向地主阶级的权力过渡和“大一统”封建专制国家的建立过程相伴随的。

西欧封建君主制的姗姗来迟，带给西方人的是神学主宰一切和哲学的停滞倒

退。而中国哲学在封建社会却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基本上是稳步前进的。其间虽也有过小的曲折，如两汉经学的神学化和隋唐佛学的兴盛，但中国的神学从来没有在整个社会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哲学对神学（主要是佛学）的批判，是由地主阶级的思想家们以自我批判的形式来进行的，它大致在 12 世纪的北宋王朝时期便已基本结束。西方哲学对神学的批判则是在四个世纪后由资产阶级的思想先驱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自然科学革命等形式来完成的，它反映的是新兴的市民——资产阶级对封建主阶级的斗争。

在这以后，西方社会进入了近代历史时期。自然科学和工业生产加速发展，机械力学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与此结盟的唯物主义哲学也因此而带上了机械论的色彩，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比较流行。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西方文明的这段历史时，便提出是唯物主义将主观能动性让给了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则抽象地发展了主观能动性。从而在哲学领域出现了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的对立，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唯物主义对黑格尔绝对理念发展的辩证法的斗争。与此不同，中国无论哪一派的哲学家都没有明显的形而上学倾向，都是重辩证法的。如果套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发展模型，则中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们没有将主观能动性拱手让给唯心主义去发展。当然，更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和文化的特殊性，中国哲学学派的二分对立格局没有像西方哲学那样严重和阵线分明。

1840 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形态的变化，中国的哲人们开始大量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哲学形态由古代哲学向近代哲学变形，但双方仍有巨大的差距，不可能完全同一。中国哲学始终是受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矛盾制约和推动的，它反映和表现的是几千年历史积淀而成的特殊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我们也就不能用一把简单的尺子来笼统地评价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优劣高下，而是应当实事求是地承认不同民族都有适应于自身文化背景和特殊社会需要的哲学思维形态，既不能夜郎自大，也不应妄自菲薄，肆意贬低自己的民族文化和理论思维。

## 二、西方中心论的偏误

西方中心论是西方曾流行一时的一种认为世界文化的真正中心和主线是从古希腊罗马开始，并在近现代的欧洲发展壮大的观点，其中在哲学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西方近代最负盛名的哲学家黑格尔的看法。黑格尔明确表示中国、印度乃至整个东方都没有哲学和哲学史，这可以说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论。他认为，“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在这里找不到哲学知识”。并从而断定：“真正的哲学是自西方开始。”黑格尔作为一位哲学巨匠，为什么会得出如此的结

论呢？他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东方是专制社会，人们的意志是有限的，不自由的；而思维、哲学是与自由同在的，意志是普遍的，无限的，它并不畏惧某一个“大力”（专制君主）。二是东方人主张自然与精神合一，主张天人一体。但这种合一不是统一，而是直接合一，是主体“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于是，“实体（客体）与个体（主体）就漫无区别了”，“一个毫无精神意味的境界（天人合一）就出现了”。因而，黑格尔主张，真正的哲学应当是主体既在客体（对象）之中，与客体合一，但同时又保持其主体自身的特性，主体是自由的，普遍的，无限的。合一应当是真正的统一，我关于客体的知识、思想，同时就是我自己的知识、思想。<sup>①</sup>

黑格尔对东方和中国思想的这些批评，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可是他的批评及其结论本身，借用他的话，也是有限的、片面的。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中国古代虽然是专制的社会，但除了个别时期（如清代的“文字狱”）以外，通常仍容许思想的自由，重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比如春秋战国学术的百家争鸣，汉唐时期的儒、释、道三家之辩和佛教各宗派之间的论争，宋代开始的新的百家争鸣等。就后者而论，仅《宋元学案》所著录的先后参加学术讨论的各学派的学者、门生和讲友就达几千人之多。正是他们的相互辩驳和自由讲论，才促成了宋明理学的产生和繁荣。如果没有思想的自由，根本不可能想像有这么多各具特色的学派和学术思想的出现。皇权的专制并不直接限制学术思想的发展，除非这种学术思想直接危及到皇权的统治本身。但即使在此时，往往也只是醉翁之意，不过是借其学术观点、语词罗织罪名，作为打击陷害政治对手的借口而已，宋代的反道学斗争便是如此。

与此相应，认为专制制度下中国人的意志只具有有限的和恐惧的品格，应当说，这一面是存在的。自孔子开始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便是如此，它表明了中国儒家有以帝王意志为意志的思想软弱的一面。但另一面同样是存在的，即儒家要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此理想和目的而奋斗的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桓谭反谶纬“非圣无法”，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乃至被杀，范缜拒绝“卖论取官”，韩愈反佛除弊甘愿献出“衰朽”“残年”，王安石“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而坚持新法，张载治学立志“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王守仁宣称道为天下之公道，“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等等，这些思想家们所表现出来的意志、品格可以说是极为宽广、无所畏惧的。他们为了创立、

---

<sup>①</sup> 参见〔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95～9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坚持和传播自己的学术主张，不惜丢官受难，甚至甘冒杀头的危险。这里仅以后期封建社会中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朱熹为例来略作说明。

朱熹是宋代道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多次遭到指控和打击。在他的晚年，朝廷上下反道学之风日盛，终于于庆元二年（1196年）发生了禁罢道学的“庆元党禁”，朱熹大弟子蔡元定被送道州编管，已丢了官的朱熹却率众学生为蔡元定饯行。两年后（1198年），朝廷以道学为“逆党”，学者人人自危，所谓“方是时，士之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宋史·朱熹传》）。不仅是道学，连儒生也不敢以儒自命了。但即使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朱熹仍“日与诸生讲学不休，或（有人）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同上），一直坚持他的讲学著述，直至临终前，都还在修改集他一生心血的《四书章句集注》中的《大学·诚意》一章。可见，即使在执政者以反道学为名行打击排斥异己之实的情况下，仍然不乏像朱熹这样的敢于坚持自己的信仰和学术主张的哲人。

其次，就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来说，黑格尔其实并没有真正弄懂天人合一的意蕴。中国古代思想家所主张的天人合一，决不意味着主体（人）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而沉陷在客体（天）里，而是正相反，天人合一的命题本身，就是建立在主体的精神自由、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基础上的。

孟子被人们视为最早提倡天人合一观念之人，因为他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著名公式。但这里并没有心（主体）淹没于天（客体）中之意。孟子所说的天，即仁义礼智的道德原则，它们构成为人的本性，二者本来是一致的。人只要能切实、充分地扩充人的良心（尽心），就能体验到内在的仁义本性（知性）；而一旦体验到内在的本性，也就同时把握到了天（知天）。心、性、天融合为一，人间再没有比这更为快乐之事。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那么，孟子的尽心知性知天，本身就是以主体的自由、普遍和无限性为前提的，是天地万物被我心所体验，而决非将自身消解于天地万物之中。

北宋张载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天人合一”的命题。他以人为中心，批判改造了儒释道三家的天人理论，将天人合一建立在虚与实的融合、天道与人性的贯通、天性心有差别地同一的基础之上。他要求儒者通过长期积极有为的学习和修养活动，最终通过对“天”的体验和认识而确立起内在的道德本体，走向“从心所欲不逾矩，老而安死，然后不梦周公”（《横渠易说·系辞上》）的充分自由的境界。由此，张载的天人合一讲的是心性的锻炼和精神境界的升华，赋予了人生以自由的充分实现的价值，这怎么能说是一个“毫无精神意味的境界”呢？怎么能说是主体作为消极、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体之中了呢？可见黑格尔的结论实在是太武断了。



至于专制制度下有没有政治自由的问题，黑格尔也把这绝对化了。他所说的专制主要是奴隶制的专制，故普鲁士的“所有人皆自由”。其实，普鲁士当时的社会（1816年）仍然是专制（封建君主专制）的社会，资本主义刚刚开始生长，与我国明清时期的社会状况相比，差别并不是很大。故资本主义式的自由在中国虽然还音信渺茫，但在普鲁士，要实现也还尚待时日。黑格尔的论据不实，他所作出的东方无哲学的结论也就只能是失之千里了。

当然，无论是黑格尔也好，还是后来的其他一些西方哲学大家也好，他们对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偏见，主要还是出于根深蒂固的西方文化优越感，不愿意花费力气认真地研究中国和东方的哲学和文化。如欧洲现代著名的《哲学史教程》的作者、新康德主义者文德尔班，便将“东方精神”视同于束缚个人创造性的同义语。他虽也承认东方的中国、印度等民族有某些哲学的“迹象”，也不缺乏对各门学科的丰富知识和关于宇宙的一般观点，但这些知识、观点或者受日常需要的限制，或者受神话的、宗教诗的控制，“都远离了自成完整体系的欧洲哲学的路线，因而一本教科书无须着手讨论”<sup>①</sup>。也就是说，与欧洲哲学不同的哲学发展道路即使存在，也不具有在哲学史教科书里作一番“讨论”的价值，故可以不予理会。

西方文化中心论明显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从另一个角度说，也给我们以深刻启示：中西文化和哲学事实上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相对于西方哲学重逻辑分析、以精确性见长的特点，中国哲学则明显是重整体把握、重系统。后者不是像前者那样走的是一条“纯哲学”的道路，从“纯哲学”出发来批判和否定中国哲学，从根本上缺乏历史的、文化的和科学的基础。中国哲学总是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联系的，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比较恰当地揭示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治学宗旨。世界文化和哲学的未来发展方向不是中化，但也决不可能是西化，而应当是中西、东西的取长补短、融合交汇。今天西方的有识之士，也已经对此产生了共识，开始承认东西方学术文化有不同的特点。在改革开放和引进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的今天，更要注意弘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坚持中国的特色，以有益于我们正从事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事业。

### 第三节 源远流长的传统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特色鲜明的哲学传统。从总体上来归纳，大致可以有如下一些基本的方面：

<sup>①</sup> [德]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3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